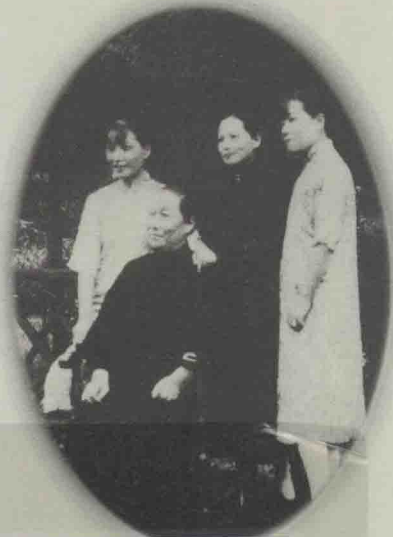


像倪桂珍 那样做母亲

杨 菁 / 著



山東畫報出版社

像倪桂珍 那样做母亲

杨 菁 / 著

山東畫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像倪桂珍那样做母亲 / 杨菁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474-0948-0

I. ①像… II. ①杨… III. ①倪桂珍 (1869~1931) — 家庭
教育 — 经验 IV. ①G78②K8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55992号



策 划 傅光中

责任编辑 郑丽慧

装帧设计 宋晓明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规 格 160毫米×230毫米

17.5印张 298幅图 150千字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7000

定 价 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引 言

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一个特殊的家庭，六个孩子，六个美国留学生，尤其是宋氏三姐妹，性格不同，却各领风骚，闻名遐迩。

古话虽有“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之说，同时亦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之言，但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如今已为人们广泛接受。哈佛图书馆有一条训言说：“谁也不能随随便便成功，它来自彻底的自我管理和毅力。”彻底的自我管理和毅力，需从小培养。从出生到死亡，人的毕生均在发展。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其生理发展、认知发展及人格和社会性发展，有其各自的特征。家庭教育、启蒙教育，不在于传授给孩子多少知识，而重在培养孩子的兴趣、求知欲，以及良好的习惯、顽强的意志。

宋耀如可谓宋氏家族第一人，他在美国的生活、学习经历，回国后集“传教士、实业家、革命者”于一身的身份，为宋家儿女的成长、宋氏家族在民国时期的煊赫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倪桂珍 17 岁即执教于上海中西女中，婚后成为全职太太，相夫教子。显然，母亲倪桂珍与孩子们相处更多、更久，她的一言一行对孩子们的影响亦更大。作为女性，母亲亦很容易成为女儿

效仿的第一榜样。宋氏三姐妹的身上均烙有母亲深刻的印记，她们终身感念母亲的教诲。

宋家六个子女的成才，固然有良好的家庭教育之规律可循，却也有其很大的特殊性。望子成龙是每个父母的愿望，但愿望能否实现，有着时代、地域、社会背景，以及孩子、父母个体差异的诸多限制。家庭教育，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循，时代、地域、人物不同，方式、方法固然不同，然而母亲、家庭的某些品质，在潜意识中可以影响孩子的一生。

先天和后天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即个体的行为有多少取决于他们的先天遗传，又有多少取决于所处的物理和社会环境的后天影响，这是个具有深刻哲学和历史根基的问题。可以明确的是，个体的特质和行为不是由先天或后天单独决定的。遗传和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相当复杂。先天是指从父母那里遗传下来的特质、才干和能力。当人类从一个由受精瞬间创造出的单细胞有机体开始，直到成为由十几亿细胞组成的完整个体，这些遗传基因的影响时刻伴随着我们的发展。先天因素不仅决定了我们的眼睛是蓝色还是褐色，也决定了我们的大脑发育方式。后天是指塑造行为的环境影响，包括生物上的，如怀孕时母亲摄入的可卡因对胎儿的影响，以及社会性的，如家长教养孩子的方式、个体所处的文化背景、社会经济环境等。在强调后天比先天更为重要的理论中有一种行为观点，其代表人物为美国心理学家 John B. Watson，他认为通过有效地控制个体的环境，就有可能塑造任何行为。他曾说：“给我一打健全的婴儿，在我所设计的环境中抚养长大，不论他的天赋、才能、志趣及家族背景如何，我保证能够任选其一，把他训练成为我所选定的行业专家：医生、律师、艺术家、大亨，甚至是乞丐或小偷。”这种观点有它的理论依据和社会贡献，但显然是片面的，它强调的是外显的行为，把更多的关注投向个体做了什么，而不是他们的头脑中发生了什么。

我们可以将先天—后天问题看成一个连续统一体的对立两端，而一些特定行为则处于两者中间的某一处。本书基于这样的认识，对倪桂珍及其孩子们的成长作了介绍？一位母亲，六个具有不同特质和才能的儿女，倪桂珍何

以能成为这样有成就的母亲？而她的儿女何以有这样那样的相同与不同？除了遗传、家庭教养外，文化背景、时代背景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生物生态学理论认为，有四个层级的环境同时影响着个体的发展。罗伯特·费尔德曼著《发展心理学——人的毕生发展》对此作了详细介绍：

微观系统 (microsystem)，是儿童日常生活的直接环境。家人、看护者、朋友和教师都作为微观系统的一部分，对儿童产生影响。然而，儿童并不只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相反，他们主动参与微观系统的建构，并塑造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直接世界。儿童发展中，大多数传统研究都指向微观系统这一部分。

中间系统 (mesosystem)，为微观系统的众多方面之间提供了联结。如同链条中的链环，中间系统将儿童与父母、学生与教师、员工与雇主、朋友与朋友相互联结起来。它体现了将人们联结在一起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例如使得父母在办公室经历了糟糕的一天，接着回到家中对着孩子发脾气的那些影响。

外部系统 (exosystem)，代表了更广泛的影响，包括诸如地方政府、社区、学校、宗教场所、地方媒体等社会机构。这些社会机构对个人发展可能会产生直接的、重要的作用，并影响到微观系统和中间系统的运转。例如，学校的教学质量将影响到儿童的认知发展，并产生潜在的长期后果。

宏观系统 (macrosystem)，代表了作用于个体的更大的文化影响。它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政府、宗教和政治价值系统，以及其他广泛的包含因素，都是宏观系统的一部分。例如，文化或社会赋予教育或家庭的价值，会影响生活于这个社会中介体的价值观念。

最后，时序系统 (chronosystem) 是上述所有系统的基础。它涉及时间对儿童发展产生影响的方式，其中包括历史事件（如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和渐进的历史文化（如职业女性数量的变化）。

生物生态学理论强调影响发展的各个因素间的相互联结。本书以倪桂珍及其家庭为例，通过倪桂珍及其孩子们生活、事业中的一个故事，试着分析她的六个儿女如何被培养成才，对我们又有怎样的启示作用。当今中国社会，对于如何更好地抚养孩子是不缺乏忠告的，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都置身于大量信息的包围中。我的观点是，印刷品或电视上的信息不全合理或正确，只有对任何说法保持批判的眼光，你才可以站在一个更有利的位置，对问题作出相对正确、合理的判断。

目 录

引 言 / 1

第一章 大脚母亲 / 1

名门之后 / 3

“母职之爱”与家庭道德教育 / 8

小 结 / 18

第二章 求学篇——宋家有女初长成 / 21

独特的家教 / 23

那年霁龄 14 岁 / 32

“小大人”庆龄 / 40

美龄——宋家最小的留学生 / 48

子文——宋家唯一受到特殊熏陶的男孩 / 55

小 结 / 60

第三章 婚姻篇——三桩婚姻，父母的三种态度 / 65

“一见钟情”的宋霭龄 / 67

私奔的宋庆龄 / 77

晚婚的宋美龄 / 94

小 结 / 110

第四章 事业篇——才华与理想的有机结合 / 113

现代版“贤内助”之一——幕后施政的宋霭龄 / 115

现代版“贤内助”之二——“嫁给”革命的宋庆龄 / 122

现代版“贤内助”之三——夫唱妇随的宋美龄 / 138

子承父业的三兄弟 / 148

“全家都在为抗战而工作” / 155

致力于妇女儿童事业的三姐妹 / 164

小 结 / 175

第五章 亲情篇——政治风云下的亲情 / 179

妈妈的爱 / 181

孤独却不失亲情的宋庆龄 / 185

宋子文与兄弟姐妹 / 193

宋美龄与儿孙 / 198

小 结 / 203

第六章 才艺篇——名至实归的才女 / 207

亦中亦西的训练 / 209

擅长国画的宋美龄 / 213

和蔼又可愛的“国母”——宋庆龄 / 221

小 结 / 233

第七章 仪容篇——风采各异的宋氏姐妹 / 237

三姐妹的审美观 / 239

风靡美国的蒋夫人 / 245

伟大的贵夫人——宋庆龄 / 252

一个另类的晚辈——孔令伟 / 260

小 结 / 263

后 记 / 267

第一章

大脚母亲

名门之后

倪桂珍（亦作珪贞），清同治八年（1869）四月出生于江苏川沙，父亲倪蕴山是基督教徒，也是个学者，母亲徐氏是明代著名科学家、礼部尚书徐光启的后裔，也是基督教徒。百度百科名片对徐光启的介绍如下：“徐光启（1562年4月24日—1633年11月10日），字子先，号玄扈，教名保禄，汉族，明朝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人，中国明末数学和科学家、农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少保，谥文定。徐光启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之一，是上海地区最早的天主教徒，被称为‘圣教三柱石’之首。”中国人研究西方学术的人自徐光启始，其一生致力于研究天文、历法、数学、水利、农业，著述甚多，以《农政全书》最为著名，并与传教士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前六卷。他曾生活、工作于上海，并在今天的虹桥路、蒲汇塘路、肇家浜路、华山路汇集处



倪桂珍这样一个有着一双大脚、受过西式教育、能在钢琴上弹奏出美妙的乐曲的女子，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简直是凤毛麟角。



徐光启 (1562 年 4 月 24 日—
1633 年 11 月 10 日)

建有农庄别业，从事农业科学实验并著书立说，逝世后即安葬于此。他的后裔在此繁衍生息，初名“徐家库”，后渐成集镇，因地处肇家浜与法华泾两水汇合处，又名“徐家汇”，遂有了今日上海“徐家汇”地名的由来。

先祖的优秀令其后裔无比自豪，在纪念徐光启诞辰 400 年时，宋美龄曾将学者关于徐光启的演讲稿自台湾寄给远在美国的哥哥宋子文，宋子文又将稿子分送给每个女儿，让她们和她们的孩子知道，她们的先祖是何等的优秀，不同凡响。徐光启何以能成就那样骄人的成绩？又为何会成为天主教徒？下面对他的经历作进一步介绍。

徐光启出生于上海一个寒素的家庭，自小在读书之余，即对农业生产颇感兴趣，当时他家居住的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法华汇尚为农村，四周是种满庄稼的农田。徐光启 20 岁考中秀才以后，先后在家乡和广东、广西教书，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广阅古代的农书，钻研农业生产技术。由于农业生产同天文历法、水利工程的关系非常密切，而天文历法、水利工程又离不开数学，他进一步博览古代的天文历法、水利和数学著作。他认为文章学问应“益于德，利于行，济于事”，秉持经世致用思想，希望利用科学技术来推动社会的发展。十多年后与传教士郭居静的第一次接触，令他耳闻目睹了闻所未闻的新鲜事，他第一次见到一幅世界地图，第一次听说地球是圆的，又第一次听到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制造了天文望远镜，可以观测天体星球的运行，他对西方的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得知来中国传教的耶稣会会长利玛窦精通西洋的自然科学，他专程前往拜访请教。利玛窦对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医学都很有造诣，且擅长制作钟表、日晷仪，善于绘制地图。利玛窦，第一个将有规模的天主教思想，以及附着着的西学呈现在中国人面前。他对徐光启的入教有莫大的影响。作为传教士，传教是利玛窦的目的，他的手段是借助上层社会。为了适应与立足于中国社会，他将科学介绍给士林，并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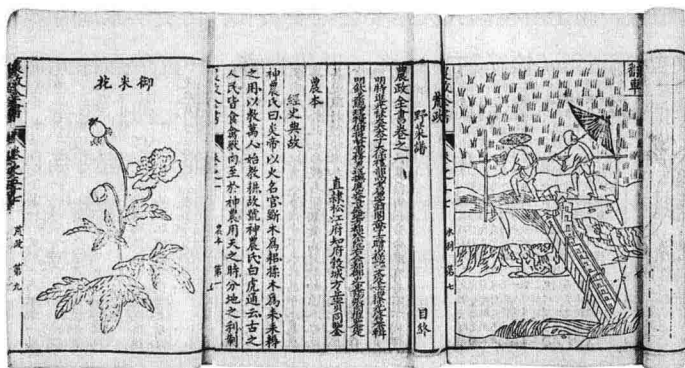
学者藉讨论道德问题而宣传天主教义。利玛窦带来的地图、三棱镜、日晷仪等新玩意儿固然引起人们的好奇，而真正对利玛窦所介绍的科学产生兴趣的不过徐光启等少数人。后来，徐光启还与利玛窦等传教士合作介绍西方科学，1607年他们合译出版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的前六卷；1612年与传教士熊三拔(S. de Ursis)合译《泰西水法》，介绍了西洋的水利工程和



徐光启与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

各种水利机械。他还为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的《同文算指》（此书介绍了西方的笔算数学）、熊三拔编著的介绍天文仪器的《简平仪说》等书写了序言。

1603年，42岁的徐光启在南京接受洗礼，加入天主教。《徐光启传》的作者黄节认为，徐光启“从事西教，思窥其象数之学，以救汉宋以来空言论学之失”。王重民在《徐光启》中表示同意黄节的看法，并作补充道：“徐光启对于我国正统的封建唯心主义理论，有其不满的一面，曾经幻想从天主教教义里面找到可以‘补儒易佛’的东西。”何俊在《晚明思想的裂变》一书中对徐光启的信教提出如是看法：“传教士们借科学以传教，这对传教士而言，乃是一种主观上的动机，而客观上的效果却是主观动机所无法左



徐光启撰《农政全书》内文



徐光启墓园牌坊与塑像

右的。毫无疑问，科学传教对于吸引中国学人入教起到了神父们预期的效果，但是一个行为的效应往往不是单一的。传教士在传播天主福音时所带来的西学本身，同样也足以引起晚明士林有心人士的关注，进而导出与基督教神学无关的思想。作为耶稣会传教士之手段与论证天主存在之方法的西方科学之于徐光启，便是如此。”简言之，徐光启的信教源于其改造晚明社会、自觉吸收西方科学的愿望。他在中西科学、文化交流方面的成绩令人瞩目。

徐光启一生为官廉正，治学严谨，是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崇祯七年赐城赐葬，崇祯十四年营葬，墓前有华表、石牌坊、石人、石马等。在其墓碑上镌有对联曰：“治历明农百世师经天纬地”“出将入相一个臣奋武揆文”。徐光启墓历经破坏、修整。1983年徐光启逝世350周年，墓地建碑廊，墓前立徐光启塑像，座上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历史学家周谷城题字。

徐家自文定公（徐光启）以降，世代为官，一直传至徐光启的第十六代子孙，他是驻守上海军队的一名首领，曾转战于上海、宝山、南汇和川沙一带，后在战斗中阵亡，官方曾在他的出生地建筑了一座寺庙以示纪念。

倪桂珍的母亲出生在徐家汇的徐氏老宅，是一个天主教徒（自先祖徐光启皈依基督教后，徐家人对天主教的信仰一直十分坚定）。倪桂珍的父亲倪蕴山祖籍余姚，是一位家庭教师和才华横溢的学者，精通法律，他由上海的伦敦会施洗皈依了基督教新教，他的妻子跟随他改信新教。倪蕴山因工作之故来到川沙，在那儿安家落户。倪桂珍是倪家的第二个女儿。据有关宋氏家

族的记载，在倪桂珍4岁时，依裹小脚的传统惯例，她的脚被痛苦地裹了起来，每天紧紧地用布条裹成那时规定的形状。她的不幸是反应比常人更糟，每天发高烧，痛苦不堪，她的不幸成就了她的幸运，大人不得不把布条松开。最后，她的父母决定，就让她的脚自然长大，虽然她可能会因此嫁不出去。

倪桂珍是幸运的，父母的开明不仅让她免受了肉体之痛，连她不喜欢却是那个时代女孩都应该学的诸如针线活这样的女红都免了，她对读书的兴趣则受到了父母的鼓励和支持。据宋氏三姐妹回忆：“自从明末文定公皈依基督教并开始注重新式教育以来，这个家庭一直保持自己的传统，对待自己的孩子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绝无性别上的偏见。”倪桂珍5岁跟一个家庭教师学写汉字、读古籍，9岁入私塾，15岁进入上海的女公会（the Woman Union Mission of Shanghai）开办的教会学校裨文女塾^[1]读书，18岁毕业。她擅长数学，喜爱弹钢琴，因成绩优异而留校任教。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倪桂珍将重视教育的传统继续传延，宋氏三才女应运而生。

受父母的影响，倪桂珍孩提时即成为施以洗礼的新教徒，教会学校的求学经历更为她日后浓厚的宗教个性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她笃信祈祷的效应和个人行善的永恒价值，并把行善发展成社会性的服务。她对宗教的虔诚信仰不仅深深了几女儿们的行事作风，也直接影响了女婿蒋介石的信仰。1927年，蒋介石在得到宋美龄同意继而请求宋母允婚时，倪桂珍曾问他是否愿意成为基督徒，蒋介石表示很愿意试一试，将尽力研究《圣经》，惟未经体察不能随便允诺接受基督教。蒋介石的态度是诚恳的，他也信守了对宋母的承诺。1930年10月23日，蒋介石在上海宋家接受了洗礼，成为一名基督徒。

[1] 裨文女塾是上海开埠后的第一所新式女子学校，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的夫人艾丽莎·格兰德（Eliza Gillete），于1850年4月15日创设于上海西门外白云观隔壁（今方斜路西林后路102号）。经费大部分来自教会拨款和社会捐款，其中又以女公会所赠款数最多。1871年裨治文夫人去世，学校由女公会和圣公会管理。1881年移交女公会单独管理，原圣公会系统的教职员工及中学部学生并入另一所圣公会女校——文纪女塾，称圣玛利亚女中，并改为寄宿制，迁址圣约翰书院之北。原西门的裨文女校仍用旧名。早期实行免费教育，1900年起每月向学生收学费5角。1951年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改名“沪南女子中学”。1953年8月又改名“上海市第九女子中学”。1966年取消女中，遂改名“上海市第九中学”。